

【国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犹太人问题”

——20世纪西方传记学者的马克思形象评析

贾向云

【摘要】马克思的犹太身份以及他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既是理解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关键线索,也是马克思形象建构的重要问题。西方学者围绕马克思与犹太人自我意识、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辩论以及马克思何以批判犹太人等问题,各自基于材料选择、价值趋向、解读范式等建构了不同形象的马克思。由于历史背景、文献资料、意识形态等局限性,他们所建构的马克思思想形象与理论面貌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偏差,有些传记甚至存在根本错误。以梅林、伯林和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记为核心,同时兼顾其他传记,比较他们的研究,厘清和辨析这些传记学者解读马克思的“犹太人问题”的差别及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助于21世纪马克思传记的建构,也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传记;犹太精神;犹太人问题;《论犹太人问题》

【作者简介】贾向云,女,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传记、马克思主义哲学(福建 福州 350117)。

【原文出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福州),2022.6.29~3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9YJC710022);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哲学视域下《资本论》商品范畴研究”(JSZM2021013)。

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反马克思主义者撰写了数量可观、类型多样的马克思传记,译为中文的亦有十几种。如,美国学者约翰·斯巴哥(Johan Spargo)最早于1910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事业》;德国弗·梅林(Franz Mehring)1918年的《马克思传》(上、下)、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921年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海因里希·格姆科夫(Heinrich Gemkow)1968年的《马克思传》;苏联学者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colaevsky)和曼岑-赫尔芬(Otto Maenchen-Helfen)于1936年合著的《卡尔·马克思:人与斗士》、彼·尼·费多谢耶夫(П. Н. Федосеев)于1973年、E. A. 斯捷潘诺娃(E. A. Stepanova)于1978年出版的《马克思传》;法国学者奥古斯特·科尔纽(Auguste Cornu)于1955年

开始陆续发表的三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传》;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以及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的《马克思传》等。

在这些传记中,以梅林、伯林和麦克莱伦撰写的马克思传记影响最为久远和广泛。他们围绕马克思与犹太人自我意识、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辩论以及马克思何以批判犹太人等问题各自作了不同解读,呈现了不同形象的马克思。梅林作为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理论家,突出马克思作为革命家的一面,全然否认马克思受过犹太人的影响;自由主义者伯林则为了批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诊断,将马克思塑造为“反犹主义”;麦克莱伦的研究趋于客观化、学理化,但却

低估了《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理论贡献,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一翼。笔者以这三部马克思传记为范本,同时兼顾其他传记,比较他们的解读差异和理论范式,助力21世纪马克思传记的建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充分、更全面。

一、马克思与犹太人自我意识

犹太人为人类社会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所有关于马克思的传记里,梁赞诺夫(D. Rjazanov)最早意识到马克思的犹太人出身对他学说和命运的影响。在192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合传》第一章,梁赞诺夫便批评了梅林在马克思传记中对马克思受过犹太人影响的全然否认。^①1936年,尼古拉耶夫斯基和曼岑-赫尔芬在合著的《卡尔·马克思:人与斗士》“起源和童年”这一章详细阐释了犹太人在德国的遭遇、马克思的家族及其父亲的改宗经历等历史背景。^②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犹太身份?马克思思想与犹太思想传统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西方的传记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关于马克思对待自己犹太人出身的态度。伯林认为马克思将其视为一种个人耻辱,“他本人或恩格斯从未直接提到过”^③。他将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态度解读为毫不妥协的敌视。他认为,由于马克思“总是感觉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粗俗鄙陋的世界中(也许他潜意识中对自己生来带有犹太人血统这一事实的厌恶,使得他这种感觉更加强烈),这更增加了他与生俱来的无情与好斗,从而产生了一个大众形象中令人敬畏的人物形象”^④。马克思之所以批判宗教(尤其是犹太教)有关的一切,部分原因是“信仰转变者有时所处的特殊难堪的境地”^⑤,以及马克思父亲懦弱屈服的态度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⑥

梅林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梅林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的父亲及其家人“放弃犹太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解放的行动,而且主要是一种社会解放的行动”^⑦。改宗基督教是犹太人中间的自由思想者在文化方面进步的表现,“这件事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而不能从其他意义上来理解”^⑧。正是由于马

克思的父亲深受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使他摆脱了犹太教的偏见,并将自由这一宝贵思想遗产留给了马克思。由此可见,梅林的 analysis 比伯林客观理性,更加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随着有关马克思文献的全面出版,麦克莱伦的分析更为严谨。麦克莱伦指出,马克思的父亲很少受到严格的犹太古老正统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可以为了从事律师职业而改信基督教。不过,马克思的父亲还是比较关注犹太人的平等权利,要求取消当时只应用于犹太人的具体律法。当谈到自己的“共同信仰者”时,马克思的父亲肯定了自己的犹太身份,而且从未将自己与他们区分开来。马克思的父亲“学识渊博、异常勤奋、表达清晰、绝对正直”,关注被压迫者的权利,这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⑨然而,麦克莱伦忽视了马克思父亲改宗与他身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密切相关,以及更为重要的是避免全家人受到当时反犹迫害的事实。^⑩

关于马克思的思想与犹太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梅林虽然客观公正地评价了父亲改宗这一进步行为对马克思思想的积极影响,但却低估了犹太文化基因对马克思思想的现实影响。他认为:“拉萨尔或海涅在他们生活的早期曾为之作过剧烈搏斗并因受到而不愈的创伤的许多东西,卡尔·马克思还在父母家里做儿子的时候就已经把它们轻而易举地降服了。”^⑪事实上,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⑫。因此,不能全然否认犹太思想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与梅林的观点完全相反,伯林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的论战篇章,是马克思“以古代希伯来先知的方式,以选民的名义发言,宣布资本主义的重负、诅咒体系的灭亡,那些无视历史进程和目标的人,必然自我毁灭和被清算的人将会受到惩罚”^⑬。基于这种思想,伯林认为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理想化,让自己认同一个没有经受过他那些特殊伤害的群体,向统治体制挥动拳头。通过对马克思人格和生活困境的心理分析,伯林强调马克思主义与犹太教、基督教救世历史的相似处,试图把马克思

主义归结为一种宗教。麦克莱伦驳斥了伯林的这种观点,指出马克思的思想甚至生活风格虽然都有着先知传统的回声,“但这种传统本身或多或少是西方传统思想的一部分,把马克思的思想归结为世俗化的犹太教,似乎是太简单了”^⑩。也就是说,马克思深受的犹太传统思想影响正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20世纪的西方学者之所以围绕马克思与犹太人自我意识产生各种分歧,一方面受历史条件所限,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并未全面出版,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科学把握;另一方面则受意识形态所限,西方学者对共产主义思想持根本敌视态度,以致戴“有色眼镜”看待马克思的“犹太人问题”。立足21世纪,客观理性地看待马克思种族血统、犹太人的自我意识,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首先,从种族血统看。很难在欧洲思想家中找到比马克思拥有更多犹太血统的人。他的父系、母系不仅都出身于犹太宗教世家,而且“16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的特利尔拉比都是马克思的先辈”^⑪。1890年,恩格斯在给奥地利一个银行职员复信中曾明确提到“我们有很多地方得感谢犹太人……马克思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⑫。这有力反驳了伯林的观点。其次,从宗教标准看。马克思又不能称之为犹太人。6岁的马克思便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形式上是一名基督徒,虽然他也并不信仰基督教。他对犹太教、基督教都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宗教是“颠倒的世界”,是麻醉“人民的鸦片”。^⑬再次,从马克思与犹太人同族的关系看马克思并未背离犹太人。虽然马克思在公开出版的著述和书信中,从未将自己置身犹太人之中。如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提到犹太人时,马克思一般称“他们”“他”犹太或“你们犹太人”。^⑭不过,这并不代表马克思背离或厌恶他的同族。1843年3月,当科隆犹太社团的代表请求马克思给当地政府机构写一份呼吁改善犹太人处境的请愿书时,他欣然同意并积极支持犹太人的解放。最后,从马克思的自我文化认同和阶级立场上看马克思

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反犹主义者。任何一个个体都不能全然摆脱原生文化的影响。强大的犹太家族传统肯定会对马克思的精神气质、现实理想、价值追求与生活方式等产生影响,但他从未被犹太血统身份束缚与羁绊,也就从未站在狭隘的民族立场思考问题。马克思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庸俗的反犹主义者。因此,对于同时代人类群体的划分,他从未采取血缘、种族、宗教等标准,而主要采取阶级分析方法。他将阶级社会的人类群体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资本主义时代指的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底层的广大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

二、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辩论

马克思如何看待“犹太人问题”?如何理解《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在马克思思想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主要是从马克思和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辩论中引申出来的论题。伯林正是基于对《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片面解读,将马克思塑造为“反犹主义”。伯林认为,马克思“批驳布鲁诺·鲍威尔反对犹太人解放的具体论点不得要领……类似于后来的许多反犹主义小册子”^⑮。麦克莱伦指出,尽管马克思的私人信件中包含着无数贬抑犹太人的词汇,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一直反犹。《论犹太人问题》的“中心论题是当代国家从市民社会的分离,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主义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失败”^⑯,这是比较公允的评析。与伯林和麦克莱伦相比,梅林正确地认识到犹太人问题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陷到反犹派和亲犹派的泥坑里”^⑰,科学地解读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所提出的人类解放的思想主旨。可以说,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态度以及《论犹太人问题》的思想解读,建构了不同范式的马克思传记。^⑱

其一,由于文献资料、意识形态等局限性,20世纪西方学者建构的马克思传记对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辩论的历史背景阐释不足。关于犹太人及其解放道路的问题,19世纪的德国不仅普遍

关注,而且讨论十分热烈。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马克思便极力反对当时的一些反犹言论,为犹太人的解放提供舆论支持。1842年8月,他在给《莱茵报》发行人奥本海默(Oppenheim)的信中写道:“请您把迈尔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市政体制的文章寄给我,如有可能,也请您把海尔梅斯所有反对犹太人的文章都寄来。然后,我尽快给您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即使不能彻底解决这后一个问题,也要把它纳入另一条轨道。”^②未等马克思反对海尔梅斯的文章完成,自谓是超越了“拥护派”和“反对派”的“批判派”鲍威尔发表了《犹太人问题》一文,这一文章立即成为“犹太人问题”讨论的焦点。马克思批评鲍威尔的观点“太过抽象”^③,与鲍威尔进行了三次针锋相对的思想交锋^④。在《神圣家族》中,面对鲍威尔和几个批判鲍威尔的人之间的争论,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赞同古斯塔夫·菲利浦逊(Gustav Phillipson)、拉比萨缪尔·希尔斯(Samuel Hirsch)和加布里埃尔·里谢尔(Riesser Gabriel)等人支持犹太人的观点。^⑤因此,以伯林为代表的西方部分学者将马克思的思想解读为“反犹主义”是错误的。

其二,20世纪的世界历史格局使得很多学者在解读《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时,并非依托具体文本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而是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各执一词。如,苏东学者着重突出马克思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的一面,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阐述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基于这种解读范式,《论犹太人问题》与同时期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彻底完成。如科尔纽指出的:“马克思既已理解到消灭导致普遍异化和人类关系物化的私有财产和金钱统治的必要性,从而就克服了自由民主主义而达到共产主义。”^⑥苏联学者费多谢耶夫、斯捷潘诺娃,以及东德学者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出版的马克思传记大都属于这一解读范式。欧美学者大多致力于将马克思还原为“人”,将马克思拉回其历史背景、思想语境,基于所谓的“中立的”“客观的”

“思想还原的”等研究立场、解读范式赋予马克思真实感,这是优点,同时也是不足。表面上客观、中立,实际上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匆匆地不作思考地阅读”^⑦《论犹太人问题》,建构马克思形象。或是如伯林一样将马克思塑造为“反犹主义”,或是如麦克莱伦将马克思思想解读为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分支、青年黑格尔的激进一翼。更有甚者,史华慈查尔德(Schwarzschild)认为,1843年的马克思之所以转向哲学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其大学毕业后生活、事业发展不顺利所致。^⑧从总体的思想发展历程看,《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开启人的解放的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的关键线索,预示着唯物史观思想的初步形成。梅林正确地认识到这点:“在这里,一副社会主义社会的图景显现了出来,虽然这副图景的轮廓还不清晰。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还在耕耘着哲学的田地;但是在他用批判的犁开出来的垄沟里,唯物史观的幼芽已经生长起来。”^⑨

其三,20世纪西方学者建构的马克思传记未能全面揭示马克思对鲍威尔解决“犹太人问题”方案的批判与超越。以伯林、麦克莱伦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大多批判共产主义思想,由此贬低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梅林以及苏东学者的传记大多注重分析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对政治解放的批判与超越,但往往忽视了马克思对鲍威尔的肯定性分析。马克思认同鲍威尔对犹太人的宗教批判,以及他对犹太教和基督教宗教对立的分析,说明了德国基督教国家的本质,而且“他把一切都做的大胆、尖锐、机智、透彻,而且文笔贴切、洗练和雄健有力”^⑩。但是,马克思已认识到鲍威尔仅仅从神学意义上考察犹太人问题,其追求的结果是以政治的手段去追求人的解放,从而“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⑪。将犹太人的解放归之于放弃犹太教这一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方案上,鲍威尔的方案不仅极其容易导致庸俗的反犹主义,而且彻底阻碍了犹太人获得解放的任何可能性。马克思则是将犹太人解放与全人类解放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家、共产主义者,恰恰表明其对犹太人命

运的深切关怀。

马克思指出,“犹太人问题”的真正本质并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只有在德国这样的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犹太人问题”才是宗教问题。在法国立宪制国家,“犹太人问题”是立宪制问题或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只有到了实行共和制的北美各州,“犹太人问题”才失去神学意义,成为真正的世俗问题。然而,即便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的、发达的现代国家美国,宗教仍然是生机勃勃、富有生命力的存在,宗教的存在与现代国家并不矛盾。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人信奉宗教的情况下,国家也可以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因此,“犹太人问题”的本质不是神学领域的宗教问题,而是世俗社会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归根到底,这是由于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政治国家使得公民的政治共同体生活和私人的市民生活出现分裂,即“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③。这种二元对立格局成为现代人生存发展的基本境遇,每个人都成了“犹太人”。“犹太人问题”不再是单个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的事情,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所体现出来的人与人相疏离和异化的普遍性问题。由此,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和人权观,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

三、马克思何以批判犹太人

马克思为什么批判犹太人?他批判的是什么样的犹太人?谁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一个“民族”,抑或是一个种族、族群,是一个宗教群体,抑或是一个经济组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长期存有争议。如梅林所指出的,关于犹太人的讨论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还未陷入“亲犹”和“反犹”的泥潭。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政治上的反犹主义开始在德国和奥地利迅速发展。恩格斯明确批判了反犹主义这种思想,指出它是文化落后的标志,“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一股反动逆流”^④。在《论犹太人问题》中,

马克思从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Judentum一词:一种是在宗教意义上,指犹太人信仰的宗教,即“犹太教”;一种是世俗意义上,指犹太人在经商牟利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唯利是图、追逐金钱的思想和习气,即“犹太精神”。

首先,犹太精神的发展不源于宗教学说,而是源于工商业的实践。鲍威尔考察的是“安息日的犹太人”,马克思考察的则是“日常的犹太人”。“日常的犹太人”大多从事商业,犹太精神就是一种经商的精神,赚取高额利润的精神,而犹太教的内容也是如此。如梅林所分析的:“他不是从宗教理论方面、而是从工业和商业的实践方面来考察犹太教的发展,并且把犹太教看作这个实践的虚幻的反映。实践中的犹太教,无非就是完备的基督教世界。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彻头彻尾地渗透了商业的犹太人本质,因此,犹太人是这个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能够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权利,正如能够要求一般人权一样。”^⑤因此,犹太教的基础本身就是实际需要、利己主义,而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犹太人的真正本质在市民社会得到普遍体现,并普遍世俗化。

其次,犹太精神在资本主义时代实际成了市民社会的普遍精神。犹太人的实际需要通过历史保存下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完成而达到顶点。尽管当时德国的法律歧视犹太人,不允许他们担任公职或成为政治代表,但由于国家在财政支持和外交上极度依赖犹太富人,使得大多数犹太富人与政治国家联系紧密。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中便指出了这一点^⑥,也对应了马克思所说的:“犹太人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不仅因为他掌握了金钱势力,而且因为金钱通过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人而成了世界势力,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⑦犹太人不用屈从基督教的教义来换取基督教的犹太化,也不需要再用与任何宗教的对立来掩盖自己的解放,而直接从市民社会的财产确立中,从基督教国家的政治解放中实现自我。犹太人是实际的基督徒,实际的基督徒又成了犹太人。维尔纳·桑巴

特(Werner Sombart)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表达了类似观点:“当我们推断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影响时,那些以基督徒身份反复出现的人,其实是犹太人。”^③

再次,马克思批判犹太精神实质是反资本主义。伯林正确地指出,在马克思那里“犹太人不再是一个宗教性的或种族性的群体,而是一个纯经济的群体,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赘物”^④。然而,伯林笔锋一转,认为尽管马克思有些地方写得十分出色,但“还是一个肤浅的分析”^⑤。这里可以看出,伯林将马克思视为“反犹主义”,这主要是为了否定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梅林科学把握了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社会描述为一种完全商业的犹太性质的思想,指出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过程中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理想;“人类解放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全新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下,人将成为自己的生活来源的主人。在这里,一幅社会主义社会的图景显现了出来,虽然这幅图景的轮廓还不清晰。”^⑥麦克莱伦在传记中也明确指出:“与其说他的文章真正针对犹太人——不论是作为一个宗教群体的犹太人,还是在更小程度上)作为一个种族的犹太人,倒不如说是针对与犹太人普遍联系的粗鄙的资本主义。”^⑦因此,马克思所批判的犹太教、犹太精神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马克思的反犹实质是反资本主义。基于此,马克思提出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能够消除经商牟利的前提,从而消除经商牟利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将使“犹太人”不复存在,“犹太人问题”得以根本解决。这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犹太人解放成为人,或者说人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不是像在鲍威尔先生笔下那样,被理解为犹太人的特殊任务,而是被理解为彻头彻尾渗透着犹太精神的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⑧

最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犹太人问题”处于犹太人与欧洲社会矛盾的初始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站在全人类解放的角度,马克思将“犹太人问题”的根本解决置于无

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解决中。马克思跳出宗教、民族的束缚,指出犹太人的解放以致任何一个民族或个人的解放,都不能仅仅从自身出发,而是关切整个人类命运的普遍的实践任务。但马克思低估了资产阶级非理性的一面,根本没有预料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犹太人惨遭大屠杀的迫害。同为犹太人出身的伯林,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仅在理论中而且在实践中得以推进。奉行自由主义思想的伯林强调文化认同、民族、宗教等思想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在同时面对英国外交政策和犹太复国运动冲突时,伯林既不加入犹太复国运动,也不选择被同化,而是选择所谓的“消极自由”以维护犹太民族的利益。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犹太人独立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会根本解决“犹太人问题”,这只是犹太人所获得的最保守的解放。

四、21世纪马克思传记的形象建构

从整体上说,相对伯林而言,梅林和麦克莱伦建构的马克思传记比较客观和理性。伯林写的马克思的传记表面上诙谐幽默,实际上不乏傲慢与偏见。一方面,用所谓的精神分析学说,将马克思刻意描述为“反犹主义”,违背历史事实和马克思的文本语境;另一方面,把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国际化这一特点,看作是一种特别带有尖刻的意味,^⑨忽视了共产主义对自由主义思想局限性的克服和超越。作为马克思人物形象、思想精髓的主要载体,马克思传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中国学者应充分发挥主体性,为21世纪马克思的传记建构提供新标准,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传记的建构与传播。

首先,尊重马克思的伟大理想和高尚品格,客观地理解和认识马克思本人。马克思从来不是一个狭隘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更不是庸俗的反犹主义者,而是坚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在20世纪世界大战、美

苏冷战的历史背景下,苏东学者和西方学者各自基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建构了不同形象的马克思。他们并不关心马克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只关注马克思的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否科学正确。西方主流的资产阶级学者为了否定这一结论,将马克思污名化、妖魔化,其根本目的是诋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20世纪下半叶以来,MEGA²的文献学最新成果使得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的生平思想研究趋向中立化、客观化、学理化。然而,他们大多将马克思的思想核心归为人本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理想是由此生发的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乌托邦主义”。如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传记中所提出的“‘全面的’个人现在处于马克思乌托邦的核心”^⑤。追根溯源,他们都未能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及他所引领的伟大思想革命,忽视了共产主义思想对世界历史格局与人类未来走向的深刻影响。

其次,站在人类思想史的高度,从总体性层面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犹太人问题”的本质是人的解放问题,关乎全人类。对“犹太人问题”的不同解答既是马克思和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的分水岭,也是理解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关键线索。马克思和鲍威尔都从全人类解放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的普遍性,批判宗教是他们共有的理论前提。然而,鲍威尔以纯粹的“自我意识”哲学引领犹太人的解放,把人类解放理解为必须通过国家改革来实现的政治解放,使自己走向庸俗的、反动的反犹主义。马克思则正确区分了“国家和人类、人权和人本身、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⑥,消解了犹太人问题的民族性质。西方大部分学者(除苏东学者)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重视不足、评价偏低甚至根本否认。梅林的《马克思传》对此进行了系统阐释,科学评价了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中所体现的思想转变。但由于梅林的长项在历史、文学方面,短处恰恰是哲学,以致他“未能足够

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的普遍性质”^⑦。这使梅林的《马克思传》犯下原则性错误,即将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并列,甚至埋怨马克思对拉萨尔有偏见,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脱离德国实际,不如拉萨尔的政策。^⑧

最后,立足全球视野,积极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21世纪马克思传记。诞生于19世纪德国的马克思,由于卓越智慧、伟大思想使马克思主义超越时空限定,成为一种世界历史意义的普遍存在。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首次将马克思的思想变为现实,进而东传到中国,并指导中国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格局与人类未来走向。因此,马克思生平思想传记的建构决不能局限于欧洲视野,而应关注其东传的世界进程尤其是在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迄今为止,马克思传记有多种版本在中国传播,既有翻译西方学者的,也有中国学者独立创作的。中国学者的研究已逐渐破除苏联模式的禁锢,同时有力反驳了西方学者的错误观点,逐渐占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制高点。立足这一基础,吾辈积极吸收和汲取MEGA²的文献学最新成果,建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传记,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发展。

综上所述,传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传记建构中,马克思与犹太人自我意识、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辩论,以及马克思何以批判犹太人等问题构成塑造马克思思想形象的核心问题。基于此,系统梳理和评析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多年以来西方学者所塑造的马克思思想形象,比较他们的研究,涤除他们的根本错误,不仅有助于当代中国学者建构马克思传记,也有助于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

注释:

①[苏联]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合传》,刘侃元译,上

海:上海春秋书店,1933年,第29页。

② Boris Nicolaievsky, Otto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Man and Fighter,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 1-14.

③④⑤⑥ Isais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51、3、5、26.

⑦⑧[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页。

⑨⑭⑮[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7、4-6页。

⑩[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53-54页。

⑪[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1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1页。

⑬ Isaish Berlin,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56.

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62页。

⑰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21-22页。

⑲ Isaish Berlin,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48.

⑳[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㉑[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3页。

㉒贾向云:《马克思传记形象建构与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28日第A06版。

㉓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54页。

㉕第一次:鲍威尔发表《犹太人问题》《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马克思发表《论犹太人问题》;第二次:鲍威尔发表《评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著述》《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等,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神圣家族》;第三次:鲍威尔发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

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111-112、121页。

㉗[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580页。

㉘[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㉙ Leopold Schwarzschild, The Red Prussian: The Life and Legend of Karl Marx,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47, p. 87.

㉚[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9页。

㉛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㉝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50、51页。

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61页。

㊱[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8页。

㊲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308页。

㊴[德]维尔纳·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安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页。

㊵㊶ Isais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91.

㊷[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8-99页。

㊸[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㊹ Isais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52.

㊺[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0页。

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1页。

㊼[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5页。

㊽[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11页。